



#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71期

2012年9月10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伦敦国王学院 联合举办首届战略研讨班纪要

【编者按】2012年8月27-28日，由伦敦国王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期战略研讨班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英国战略研究学界的三位资深教授和学术新锐 Andrew Lambert、Joe Maiolo、Alessio Patalano 受邀来华主讲，议题包括：“英阿马岛战争三十周年回顾：经验与教训”和“海军角逐与世界秩序：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现将三位学者在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内容摘要编译，供参考。

### 一、英阿马岛战争三十周年回顾：经验与教训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即马岛）的进攻使英国政府措手不及。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情报部门因未能提供充分的战略预警以避免阿方的偷袭而备受指责。战争结束之后，国会调查了情报和战略预警的质量，由此突显出英国情报工作的短板。

Joe Maiolo 认为，英国在马岛战争中的情报失误可以用“预警失败”的一般模型来解释。如同美国政治学家 Richard Betts 所指出的，大多数的预警失败并不能单纯归因于情报官僚机构的错误或者是其收集和分析原始数据能力的低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提供的信息是有效的，并且情报官员往往也发出了预警；失



误的真正原因通常存在于政治领域而非情报技术方面的问题。

在 Joe Maiolo 看来，1982 年 4 月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进攻并非晴天霹雳，英阿之间围绕该岛的主权归属长期关系紧张，阿根廷的进攻是一段长期政治冲突积累的爆发。早在七十年代，阿方外交官就曾多次警告动武的可能性，但这种威胁却被英国方面视为是阿讨价还价的策略之一。预警失败以及由此没能有效地阻止或应对，是由战略和政治过失造成的，而非仅仅是情报机构的错误。在马岛战争的例子中，最根本的失误要追溯到 1965 年的一项政策。面对到底是彻底忽视马岛居民的关切而与阿根廷达成妥协，还是拒绝在主权问题上协商而花极大成本来武装保卫马岛，历届英国政府都没能在二者间做出明确的选择。

Andrew Lambert 分析了英国在马岛战争中的应对。他认为，英国虽未能成功预警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突袭，但最终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其主要原因有：首先，英国的海权国家属性使其对福克兰群岛十分重视。虽然该岛远距英国本土 8000 海里之遥，但对于英国却具有重要意义，是其进入拉美地区的门户。其二，英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海军文化和传统。英国对危机的最初反应就是诉诸海军。在马岛战争中，英国动员了整个海军，而不仅是若干士兵。其三，英国在阿根廷进攻后反应迅速，组织严密，英决策高层马上取得了夺回岛屿的一致意见。海军展现出了高度的专业性，训练有素的海军军官和水手在与阿方的速战速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Alessio Patalano 讨论了英阿马岛冲突对日本海军战略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从战术性航母在现代海军作战中的潜在作用上看，从现代反潜艇战争的复杂性上看，还是从潜艇在战争中的破坏力上看，1982 年的马岛战争都给日本军方上了重要一课。但这场战争并未在战略层面上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并未使日本武器采购方面的政策发生明显转变。日本海军战略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安全政策基础之上，这一政策并不考虑将军事力量投射到远离国家海岸线的地方。对于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来说，马岛战争强化了已有的选项，使得日本海军领导层更加确信 1976 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关于加强对重要海上通道的防卫的决定应加快落实，并使他们意识到冷战也不完全就是“冷”的，也可能会变成热战，即使是对于美国的亲密盟友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提高应对有限战争的水平。

## 二、海军角逐与世界秩序：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

Lambert 教授将 1782—2012 年 200 年的英美关系史作为一个权力和平转移的

案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虽然英美看上去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不能忽视两国之间本质的文化差异和世界观的不同。英美差异的核心在于海权国家的性质。虽然海权一般用于描述国家的特定战略和政策选择，但 Lambert 以整个国家与海洋的互动程度来界定海权国家，即专指那些失去了对海上航道的控制就将变得十分脆弱的国家。按照这一定义，只有极少数的海权国家在其所处的时代中获得了大国地位：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不列颠。这些国家都是完全依赖海上贸易来保证其经济繁荣和大部分的食物供应，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将使其被置于毁灭之地。这些脆弱的国家因无法成为陆上强国，只能成为海权国家以最大化它们的相对优势。

在 Lambert 教授看来，海权国家具有如下主要特点：(1) 不同于陆上帝国，海上帝国控制贸易航路——它们占据作为战略节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而避免陆上扩张；(2) 以现代标准衡量，海权国家拥有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3) 海权国家有自己的海军英雄和海军文化，海洋属性在它们的语言、庆典和艺术中得到充分展现；(4) 海权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它们尝试理解邻邦，并发展关系；它们为贸易和关键利益而战，而非领土。相比之下，美国虽然继承了英国的遗产，却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其防卫体系一直由陆军和空军主导。海洋之于美国的地位是边缘化的，现代美国像另一个罗马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拥有惊人的人力、资金和工业资源的陆权国家。今天的美国虽然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却如一个典型的陆地国家那样思考和行动。英国则非如此。

Lambert 教授指出，认识到这一根本差别对于理解两国在过去两百年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两百年中，英国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并将海权国家的重担交予美国。这场权力转移出乎意料地简单，也相对平稳，因为两个国家及时、妥善地处理好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它们在 1782 年后再没有对各自的生存构成过威胁。在发生权力转移的 20 世纪的三场国际冲突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英美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都认为德国和苏联对它们的生存、生活方式和商业利益构成了根本威胁，而这些威胁来自陆上而非海洋。

Maiolo 教授通过分析一战到二战之间海军军控机制建立、维持和崩溃的原因，试图阐明军备竞赛与国际秩序之间的普遍联系。他认为，一战后出现的海军军备控制机制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突破性进展，代表了大国之间多边军备控制的第一次持续性努力。战间期的海军军备控制与竞赛证明，成功的军控和军备竞赛的强度可以反映国际关系的一般状态。当时局相对稳定、未来看起来也比较平稳时，军控是大国之间维持海军平衡的有效手段；当国际体系因修正主义大国挑战现状而



开始崩溃时，军控也无法扭转局势。虽然海军的激烈角逐更多是国际秩序崩塌的表征而非原因，但不能由此推论军控就是无用的。这一机制对于稳定一战之后的全球海军平衡是有效的，并且通过条约规制为潜在和危险的军备竞赛设置了障碍。

Maiolo 认为，海军条约体系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海军力量在一战中的崛起。英日两国都以建立自己的宏伟计划来回应美国的庞大海军扩建计划。因认识到这一即将开始的军备竞赛的危险性，世界海军五强在 1921—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30 年 1 月，各海军强国在伦敦集会，解决了巡洋舰吨位问题的争议，并将建造战列舰的禁令延续到了 1936 年。条约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各大国都认为这一机制总体上对自己有利。巡洋舰的争议事关游戏的具体规则，而非是否需要游戏本身。

在 1930 年和 1936 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之间，国际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经济大萧条撕裂了英美法三国，而这三国本应联合应对全球经济和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的崩溃。悲惨的经济状况促成了德意日三国激进政权的上台。1932 年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两年后无果而终。到 1936 年全球军备支出增长了三倍，建立新的军备控制机制前景渺茫。二战的爆发则使得海军军控机制彻底崩溃。

Patalano 以 20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为例讨论了海权国家与东亚地区秩序的关系。他认为，(1) 海军力量的使用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演进之间存在持久的关联性。东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军的重要性：东北亚从构造上来看是一个“海上区域”，各个重要行为体为海洋所连接。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东亚崛起的案例是对海军角色及其对地区事务影响力的一个有力提醒。(2) 海军在日本崛起成为地区霸权 and 之后的溃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按照 Lambert 的定义，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权国家，战前的日本是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陆权国家。(3) 日本的例子似乎说明，崛起中的海权国家并不一定是改变现状的国家。作为日本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海军成为这样一种观念的牺牲品，即认为海军的排名和规模比它应服从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更重要。日本海军当局对国际体系日益不满，并认定挑战这一体系是日本唯一的出路。最终，海军因对其地位和能力的维护而自掘坟墓。

(赵寒玉编译，于铁军校)